

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 再造新文明的努力》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256頁。

蔡旻遠*

新文化運動作為中國近現代史領域的經典課題，相關研究開展甚早且成果豐碩。¹近年學界轉向強調多元視角，通過並置不同版本的歷史敘事，呈現「歷史的複調」。在此研究趨勢下，若干子題重新獲得關注——「梁啟超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即是一例。²其中，周月峰近著《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殊值關注。本書內容按時序組織，首先以社群視角，將梁啟超（1873-1929）及與其志氣相投者名為「梁啟超系」（頁14、19）；隨後刻劃該心靈社群（community of mind）的思想特質；最後則闡明其秉持特定思想，展開文化事業，從而介入並形塑新文化運動樣貌的動態過程。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¹ 最早亦是最經典者當為：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書中提及廣義、狹義的五四，實提示五四事件與新文化運動兩者實為密切又應細緻區分的事件。陳建守進一步梳理包含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具體所指及歷史脈絡，詳參氏著，〈作為集合事件的「五四運動」：五四的概念化與歷史書寫〉，收入黃克武主編，《重估傳統·再造文明：知識分子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412-444。

² 較早關注者有：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初版於1978年）；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1920年前後為中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近期重新關注者尚有：陳捷，《研究系與〈時事新報·學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

本書章節安排上，除〈緒論：複調的五四〉、〈總論〉（即結論）和〈附論〉外，正文共分八章。依內容性質可以 1920 年為界，分作前、後兩期，各自四章。前期四章可細分為二，第一部分關切思想界群體間的互動，由第二、三章：〈立異以求同：《新青年》的競爭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藍公武與《新青年》同人的互動〉組成。作者由張東蓀（1886-1973）、藍公武（1887-1957）所主持的《學燈》、《國民公報》入手，敘述梁啟超系在《新青年》成為領導性論述（leading discourse）後，如何改變自身立場，與之呼應、競爭。第二部分，即第四、五章：〈走向革命之一：張東蓀的總解決方案〉、〈走向革命之二：社會主義的新文化運動〉，則將視角轉向群體內部，集中剖析梁啟超系前期要角張東蓀的思想內涵。作者一方面指出張氏思想特質具有社會改造、尋求總解決和革命性的社會主義性格；另一方面則闡明張氏曾獨自在中國展開一套自成體系，迥異於後期風格的文化事業。

後期四章則涉及梁啟超系的歐遊經驗及歸國後的思想轉折，亦可細分為二：其一探究梁啟超系後期的思想緣起、流變及特質，分別對應第六、七、八章；另一則關注梁啟超系就文化、政治層面的互動關係，見諸第九章及附論。就前者觀之，第六章〈歐遊求曙光：重新認識中西的意象〉描述梁啟超諸人的歐遊經驗如何促使他們重估中西文化價值，並借鑒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倭伊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思想，奠定「另一場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第七章〈從革命到改良：刪去「解放」的《改造》〉，則闡明梁啟超系由前期「革命」至後期「改良」的思想轉折，並指出該系針對《解放與改造》雜誌的整頓，正是其理念轉向的具體展現（頁 144）。第八章〈型範未定：化合中西的再造文明之路〉，則指出梁啟超系思想最具特色之處，在於摒棄既有思想典範，擘劃一個不預設目標，將中國文化視為主體的文化改造事業（頁 178-179、183）。第九章〈築基礎與造勢力：文化運動的政治走向〉的核心問題是：文化是否應該、又是如何介入政治（頁 196）。作者以「築基礎」與「造勢力」歸納梁啟超系活動的兩大特質，揭示其文化活動有著明確

政治動機，最終導致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化（頁 216）。而在附論〈錯位的戰場：孫中山與胡適的新文化運動〉，則指出時人對新文化運動的認知，多有其文化或政治上的側重（頁 245），這導致各方往往處於對方論域的邊緣位置（頁 253）。

最後，作者將梁啟超系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總結為二。其一是調節橫流，作者認為該系在新文化運動的不同議題上，分別扮演著追隨、角逐、調節《新青年》論調的角色（頁 223-224）。其二，作者強調梁啟超系本身就是形塑新文化運動的建設性力量，並指出該系藉由提出不同類型的文化方案，帶來更多響應新文化運動者，從質、量兩個面向豐富新文化運動（頁 226）。

本書架構與內容概要大致如上，以下將進一步闡明本書三個相互交織的創獲：研究方法的創新設定、思想特質的深描細寫，以及強調思想動態性質的比較書寫。首先，學界近期在強調「歷史的複調」時，主要就兩個面向著手：其一是「研究主體」，措意於過往較少關注的人物、群體；另一則是「研究框架」，例如從既有的「新／舊」、「左／右」，進一步發展「中央／地方」、「理性／唯情」的分析視角。³然而，梁啟超及其社群（研究系），早因其非新非舊、難分左右過渡性質，受到廣泛關注，從而累積豐碩成果，欲加以突破的門檻極高。⁴於此，作者的回應方式是捨棄過往慣用的「研究系」，另行設定「梁啟超系」這一後設分析框架，將研究焦點置於文化事業，並懸置其政治事業。此一操作有著三項優勢：第一，使研究聚焦於特定人群的特定行動（文化事業），而無需關注其他研究系成員所涉及的政治活動，這使得書寫研究系這一鬆散群體的各式龐雜活動成為可能。第二，藉由觀察特定人群思想與實踐層面的連結，檢視其思想態度的轉變如何影響群體的活動準則，進而塑造其文化事

³ 以中央、地方的框架切入，可參：瞿駿，《大風起兮：地方視野和政治變遷中的「五四」（1911-192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唯情和浪漫主義的視角參考彭小妍，《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⁴ 可參：李達嘉，〈五四運動的發動：研究系和北京名流的角色〉，收入李達嘉主編，《近代史釋論：多元思考與探索》（臺北：臺灣東華書局，2017），頁 119-179；黃克武，〈一個流產的結盟：胡適與研究系（1919-1922）〉，《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1），頁 111-174。

業的樣貌。第三，提供較宏觀鳥瞰的視角，與過往個人傳記式的細緻研究成果對話。⁵換言之，這一方法不僅呼應學界對「歷史的複調」的訴求，亦提高研究課題的可操作性。同時，更填補過往研究未有效處理的縫隙，亦即廓清梁啟超系這一群體的歷史位置與活動樣貌——他們雖身處五四新文化運動核心，日後卻因國、共所主導的意識形態，成為歷史的失語者（頁 14）。

研究框架的創新設定，順勢引領作者就梁啟超系文化事業的視角，梳理該系思想特質，並將之歸納為三：「解放」/「改造」、「型範未定」/「思想解放」以及「築基礎」/「造勢力」。本書的第二項重要貢獻，即是對這三組思想特質的深描細寫。

第一組「解放」/「改造」所呈現者，是該系文化態度與行動的基本前提。兩者的根本差異在文化行動是否要在保留中西文明的基礎上展開，「解放」認為無需保留，「改造」則反之（頁 151-152），具體則表現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即「研究問題」、「輸入學理」（介紹西洋新知）兩者到底孰輕孰重（頁 155）。「主義」偏向抽象原則而脫離現實，「問題」則關注政治、社會層面的具體課題，與現實相對緊密（頁 156、159）。換言之，「解放」/「改造」的思想史意義，除了是兩種不同文化態度、行動的前提之外，更涉及兩種文化、政治的互動連結方式。

第二組「型範未定」/「思想解放」，則涉及該系思想獨樹一格之處。「型範未定」主張擺脫對既有典範（歐、俄、傳統文化）的執著，不預設框架、方向，而是通過研究、修正與實踐的方式，尋找再造文明之路（頁 174-175）。「型範未定」的基礎則是「思想解放」：旨在去除一切典範的神聖地位，僅將其視為思想資源輸入中國（頁 178）。這一思想工作，加上具「改造」意涵的文化觀，使其文化事業呈現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特質，並對西方文明有深刻反

⁵ 高波針對張東蓀的研究，同樣觀察梁啟超歐遊歸國後，帶回一套整體、針對《新青年》的計畫，亦關切《解放與改造》至《改造》的意涵。然因研究旨趣不同，高波採取類似思想傳記的書寫方式，不免使其較少就群體角度評價張東蓀的思想高度。詳參：高波，《追尋新共和：張東蓀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 199-207。

思（頁 180-181、183）。然而，由於未能提出一套完整理論體系，加上不敵思想界整體環境的變化，這一思想嘗試最終僅能是一「被放棄的選擇」。⁶

第三組「築基礎」/「造勢力」，則將目光置於梁啓超系文化事業的政治性格。「築基礎」是面對社會中堅分子的文化改造運動，旨在為政黨政治、共和政治打下基礎；「造勢力」則是藉由文化運動組織政治力量，並從中吸收、養成人才。作者敏銳指出，梁啓超系與《新青年》群體一個不容忽視的差異，正在於是否主動吸收其影響的人才，轉化為自身的政治力量（頁 210-214）。質言之，梁啓超系的文化事業，「文化」既是目的，亦是實現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徑。

本書細緻梳理梁啓超系思想特質的工作，凸顯其思想層面與《新青年》競爭的底蘊。然作者並未止步於此，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亦隨之而來：採取動態的思想史書寫方式，「勾勒五四思想界動態的『肌理』（Sinews）」（頁 31），以呈現不同人物、社群就特定議題此呼彼應的歷史圖景，藉此凸出形塑該系思想特質的脈絡，並側寫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界的樣貌。具體操作上，以「歷時性」與「共時性」兩條相互交織的軸線展開：前者梳理群體內部思想的變化軌跡，後者探究不同群體就思想層面的交涉互競。

就歷時性的分析言之，1920 年的歐遊無疑是梁啓超系思想轉折的分水嶺。這一轉折的重要背景，根植於該系成員在 1919-1920 年間，各自處於「獨特的『缺席』與『在場』的狀態：歐遊的梁啓超諸人「缺席」國內的五四運動，「在場」於一戰後頹勢漸顯的歐洲現代文明，留在中國的藍公武、張東蓀則恰好相反（頁 117、136）。這一歷史際遇，使歐遊者似乎看見中國擺脫文化追趕者角色，出現「捷足先登」的可能性（頁 119）；而身處中國者則選擇擁抱激進的學生運動。這最終導致群體內部思想進路的分歧，並表現在前、後期迥異的思想特質之上（頁 20-22、136）。

⁶ 另參：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啓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再版）。

前述歷時性的比較書寫，呈現梁啓超系從「解放」到「改造」，由「激進」至「漸進」的思想轉變趨勢。通覽全書，不難發現梁啓超系在前、後期所發展出的文化方案之間存在張力，更與《新青年》、國民黨人的主張產生分歧。對此，作者通過多層次的共時性比較，廓清這些異同：一是前、後期與《新青年》的對比；二是群體內部就 1920 年思想轉向後的態度；三則是擴大視野，關注不同社群改革方案的特質如何影響其互動。

梁啓超系在前期階段主要聚焦於社會層面，較少涉入由《新青年》開展的文化議題。隨著張東蓀、藍公武調整自身立場，響應新思潮後（頁 41、56），梁啓超系一方面成爲《新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上的同路人，另一方面也開始競爭文化課題的主導權（頁 50-51）。惟雙方此時課題的偏重仍有所不同，衝突尚不顯著。隨著梁啓超系後期思想主張的轉向，更大程度以思想、文化角度參與新文化運動後，雙方的異同與爭論便被放大（頁 221）。特別是梁啓超系歐遊歸國後，帶回一系列全面的文化事業，更帶給新派人士偌大壓力，大有一躍成爲新文化運動「正軍」的趨勢（頁 229-230）。梁啓超系的思想轉向，不僅改變了與《新青年》的互動，也引來茶壺裡的風暴。張東蓀便直指這一文化態度上的退縮，將邊緣化自身的文化訴求，甚至不惜在報紙上公開內部的爭論（頁 150、164-165）。之後，本書轉而關注梁啓超系與其他社群的互動。梁啓超系在前期階段，儘管側重社會層面而與國民黨人的主張相近，卻因態度尚不夠激進，而被國民黨人多所責難。後期階段，儘管轉向思想、學術層面，卻因強調傳統文化的傾向而和《新青年》對立，更因放棄前期具革命性的社會改造方案，招致國、共兩黨的批評（頁 224-225）。饒富趣味的是，儘管梁啓超系的文化方案時與各方群體產生摩擦，但他們嘗試在政治、文化活動中吸收青年學生，卻又與國、共兩黨殊途同歸（頁 208），這正顯示民初思想界各方思想既對立又交融的一面。

總體而言，作者藉由對「思想肌理」的描寫，一方面呈現梁啓超系內部的思想轉折，另一方面則勾勒梁啓超系如何以追隨者、角逐者、調節者的多重立

場參與新文化運動（頁 223）。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系與各方勢力普遍存在的摩擦，顯示其獨特的思想特質，使之在思想界占據一個獨特且備受關注的位置。簡而言之，作者藉由闡明梁啓超系思想特質與思想動態形成的過程，從而定錨並評估該系於新文化運動中的位置及成就，獲得不容忽視的成果。惟筆者認為尚有若干可資分疏與延伸討論之處，茲分述如下。

首先，就分析框架而言，作者在「梁啓超系」定義上的掙扎（頁 14-20），恰恰反應人際關係的軟性邊界，本就難以清晰勾勒劃分。儘管作者審慎地將「梁啓超系」限縮至梁啓超、張東蓀、藍公武、張君勱（1887-1969）、蔣百里（1882-1938）五人，然全書涉及張君勱、蔣百里的論述相對有限，筆墨大抵集中於張東蓀、梁啓超二人，導致書寫篇幅的分配有所失衡。同時，「梁啓超系」這一分析框架的重要功能在於將「研究系」的文化、政治事業兩相區隔。然而，對於梁啓超這樣帶有傳統士人色彩者，其事業是否真能清晰劃分為文化、政治兩個範疇？筆者認為在區分其事業類型時，不應忽略兩者可能都兼具文化與政治的性格，亦即：在書寫「梁啓超系」的同時，應追問是否與廣義的研究系有所呼應與聯繫？例如，林長民（1876-1925）在梁啓超展開「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之際，也曾連同梁氏就組黨一事與胡適（1891-1962）等人聯繫。以此推敲，林長民的「組黨」，以及梁啓超系的「造新黨」，背後思維似乎相同：拉攏人才，作為政治資本。換言之，梁啓超系的文化事業固然帶有政治、文化性格兼具的一面，然而研究系成員的若干活動又何嘗不是如此？甚至可說在另一面向上，呼應並實踐了梁啓超系的文化事業。這一調整，或將有助於觀察梁啓超系與研究系的內在互動與相互呼應的複雜層次。

其次，本書對文化事業的思想層次著力甚深，然實務層次則著墨有限。就筆者管見，梁啓超系之所以讓胡適感受到「被包圍」的壓力（頁 230），不單純僅是思想上的創見，更與掌握的物質、社會資源，以及具體實踐高度相關。作者敏銳點出 1920 年之前，張東蓀掌握梁啓超系在上海的核心報刊、人脈，具有影響輿論界的巨大能量（頁 102），梁啓超系更是與最大的出版機構商務

印書館關係良好（頁 226）。然整體而言，和實務相關的討論仍顯零散（頁 132-136、177、226、228）。此外，相較於梁啟超系 1920 年在報刊輿論上的強勢，雖然《新青年》群體並未有如此紮實的根基，然而他們與國民黨人的優勢在於掌握大學作為思想與活動的基地。⁷這一差異解釋了何以梁氏積極嘗試與南方教育圈聯合，而國民黨亦創辦「民智書局」，與梁啟超、商務印書館針鋒相對。⁸換言之，各方的行動邏輯與其所掌握和依賴的資源息息相關——文化事業終究不是純然思想上的交鋒，就實務、物質層面的投入亦不容忽視。筆者認為，就這一角度出發，或能彌補本書篇幅比重上的失衡——張君勱、蔣百里二人的貢獻，恰多表現在這些具體事務上。

最後，作者認為梁啟超系帶有強烈政治性格的文化事業，促使「文化運動政治化」（頁 215、228）。這一觀察是否提供另一理解激進化的視角？依余英時（1930-2021）之見，近代中國的激進化，肇因於對西方理論不求甚解即強行移植，以及對傳統文明缺乏理解而全面貶斥。⁹那麼歷史的弔詭之處，正表現在梁啟超系的文化事業實具內在張力的兩張面孔上：其思想面貌展現調和、漸進的特質，但其政治性格卻助長了激進化潮流，從而消解自身思想的影響力。於此，不禁引人深思，倘若清末民初以降的文化激進、漸進者，最終都助長思想界的激進化，那這一趨勢究竟是「各種歷史偶然性的疊加」，抑或「終究無可避免的必然」。

⁷ 參見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以 1920 年前後為中心》，頁 68；高波，《追尋新共和：張東蓀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頁 201。

⁸ 參見高波，《追尋新共和：張東蓀早期思想與活動研究（1886-1932）》，頁 201；丘文豪，〈1920 年代梁啟超往來南北的政治實踐〉，《國史館館刊》，期 40（2014 年 6 月），頁 33-70。

⁹ 余英時涉及「激進化」論述的文字繁多，就筆者目力所及：〈「創新」與「保守」〉，《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臺北：三民書局，2015，二版），頁 103-111，特別是頁 106-107；〈20 世紀中國的激進化〉，收入程嫩生、羅群等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頁 537-563；〈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弘雅三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1，三版），頁 195-204，特別是頁 201 以下的分析；〈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香港中文大學廿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一九八八年九月）〉，《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2021，三版），頁 195-235。近期回顧余英時這一觀點較佳者，當參：翁稷安，〈「革命的果實轉化成了對他們自己的毀滅」——試論余英時對中國近現代激進化的思索〉，《思想史》，期 12（2023 年 12 月），「史思傳薪：紀念余英時院士專號」，頁 285-320。

人們常忽略近在眼前、習以為常之事，許多學術課題亦復如是。作者正如其筆下的梁啟超系，不盲從既有研究典範、框架，亦不多用理論包裝，而是透過新的人群視角設定，細緻梳理思想的靜態特質與動態肌理，從而照亮了學界過往研究所忽略的暗處。